

20世纪50年代中期泰中关系 从紧张走向缓和的原因

(泰国) 黄瑞真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871)

[关键词] 泰中关系; 双重国籍; 泰国; 华人

[摘要] 受冷战思维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初期, 泰国唯美国外交政策马首是瞻, 不仅拒绝承认新中国政府, 而且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 对中国实施贸易禁运, 中泰关系基本处于隔绝状态。但是, 冰山终有松动的时候, 中泰关系于1955—1957年出现了短暂的缓和。究其原因, 除了受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政策等外在因素影响外, 更主要的动因还是来自泰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压力。

[中图分类号] D822.33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099(2008)06-0062-09

Reasons behind the Mid-50s Thailand-China Relations— from Tension to Relaxation

(Thailand) Huang Ruizhe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Keywords Sino-Thai Relations; Dual Nationality; Thailand; Ethnic Chinese

Abstract Bearing “Cold War mentality”, Thai government carried out pro-America foreign policy towards China in the early 1950s. It not only refused to recognize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ut also opposed China to joi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what's more, it lifted its embargo on trade with China. Therefore, the two nations are almost in isolation from each other until in the years of 1955—1957, during which the iceberg began to melt and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emporarily eased off.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s behind this change: the then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China'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Thailand, the last and also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pressure from Thailand's domestic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二战结束后, 美苏战时同盟关系破裂, 美苏主导的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分别形成。美国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 在全球范围内构筑反苏反共包围圈, 竭力将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中间地带”国家纳入自己的阵营, 建立反共同盟。泰国作为一个地理位置靠近苏、中社会主义阵营的东南亚国家, 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美国自然不会放过。因此, 从1945年至1954年, 美国对泰国的政策几经变化, 最终和泰国建立了同盟关系, 将其绑在了反共的战车上, 使其成为美国在东南亚遏制共产主义的重要战略基地。而另一方面, 中华人民共

和国于1949年成立后采取了“一边倒”政策, 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 泰国采取完全敌视中国的态度, 对外抵制新中国政府, 对内镇压华人华侨, 泰中关系处于基本隔绝状态。

然而, 1955—1957年, 泰中紧张关系一度出现缓和迹象。1955年4月, 中泰外长在万隆会议期间首次举行会晤; 1955年底, 时任泰国总理披汶派出秘密使节访问北京^[1], 两国代表随后又在缅甸秘密会晤并签署了一项旨在促进友好往来的联合声明; 1956年5月, 泰国外长称: “关于承认中

* [收稿日期] 2008-05-16

[作者简介] 黄瑞真,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2004级博士研究生。

国问题,泰国已改变原来的立场,一旦中国进入联合国,泰国就会承认”^[2];同年6月,泰国政府解除对中国的非战略物资贸易禁令,并放宽了泰国人民与中国人民来往的限制,截至1958年10月沙立上台前,已有24个泰国代表团访问了中国,而且几乎都受到周恩来总理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的接见^[3]。此外,为了向中国领导人表示泰方改善泰中紧张关系的诚意,披汶还导演了一场“人质外交”,将其幕僚帕他努泰的两个孩子秘密送往北京,理由是:“由中国政府照顾(这两个孩子),我们可再次向周恩来表示我们要改善关系的真诚决心和我们对中国的绝对信任。没有哪一种信任要比这种骨肉之情更深厚。这是两国关系的一个开端,这种关系要一代一代传下去。”^[4]

泰中关系能够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现短暂的缓和,除了受国际大气候转变的影响外,更主要的动因来自泰国国内。

一 国际形势暂趋缓和,披汶政府外交政策“见风使舵”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生效,冷战后的首场热战由此冷却。从表面上看,中美两国在这场战争中似乎打了个平手;但是,从政治影响的角度来看,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敢于对抗实力悬殊的西方头号强国——美国,这已经是新中国的一大胜利,大大提高了新中国在亚洲的政治影响力。与此同时,中国政府逐渐放弃东西方两大阵营的“二元”战略思维,提出非意识形态化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且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这一时期,中国政府领导人不断地向外界释放中国愿意缓和中美关系并促进地区和平的诚意。1954年8月接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毛泽东指出:中国希望和平,也希望美国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1955年5月接见印尼总理时,毛泽东又重申了中国希望与美国和平相处的愿望:“如果美国愿意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期都可以,五十年不够就一百年”;1955年5月,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就缓和远东局势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想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谈论缓和远东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5]该声明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的好评。与此同时,西方阵营在是否承认新中国政府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英国、加

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纷纷要求美国接受共产党已成功执掌中国政权的事实,承认北京政府是中国合法政府,并接纳新中国加入联合国。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美国于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与中国举行大使级会谈^[6]。

泰国政府及时捕捉到了国际紧张形势有可能趋向缓和的信号。在中美苏等国还在朝鲜停战协议进行谈判的时候,泰国总理披汶就敏锐地意识到国际政治环境可能出现重大变化,认为泰国的外交政策需要适时调整。1953年6月10日,披汶在内阁会议上提出,泰国应该对朝鲜半岛可能出现的停战情况做好应对准备,尤其是要考虑对华政策问题。披汶在会上同时提出“如果美国人撤出亚洲,我们该怎么办”等问题。经过几次讨论后,内阁会议决定委托时任外交部长那拉底负责密切跟踪形势的发展,并及时拟定相关的政策措施^[7]。1955年10月,披汶亲自询问美国驻泰大使,美国是否已经改变了反对共产主义中国的立场,对华政策又有哪些变化。美国大使答复说,美国政府仍然坚持反对共产党中国,继续支持中国国民党政府,同时依然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加入联合国。但是,披汶并不完全相信美国人的说法,在会见美国大使后没几天,他就针对外交部关于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的报告做出批示:“目前形势已发生变化,该是重新考虑我们政策的时候了。”^[8]1956年6月,泰国外交部长那拉底公开表示,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是一个真正有权力并且足以控制整个中国大陆的政府,这已经成为一个谁都不能否认的事实,中国进入联合国的资格已不成问题,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他说,泰国虽然已经承认台湾政府,但这并不表明泰国的对外政策将永恒不变,相反,泰国对外政策必须根据国际情势的变化而变化^[9]。

事实上,泰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也源于泰国外交政策“随风倒”的历史传统。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拉玛六世宣布泰国保持中立,后来眼见协约国取得战争优势,遂于1917年对德宣战,获得了战胜国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披汶眼见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侵略战争取得节节胜利,遂放弃早先宣布的中立立场,转而与日本结盟,公开向英美宣战。历史已经证明,泰国的外交政策并不是始终不变的。

披汶的反华立场并不是根深蒂固的。1949年1月21日,英国政府就中国内战问题向泰国政府递交

了一份秘密信函。英国政府称，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所取得的胜利，很有可能刺激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一旦中国共产党控制了全中国，其与泰国国内共产主义势力的联络就易如反掌，届时共产主义思想必将以各种形式在泰国传播。为此，英国希望泰国能“就共产主义威胁东南亚国家安全一事表达自己的看法”，并愿意与泰国共商防范措施^[10]。但是，披汶政府并未对英国的建议做出正面回应，披汶还公开表示，与即将诞生的共产党中国建交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同年3月，披汶又宣称：“通过管制报刊和实行新闻检查制度，驱逐那些设立非法组织的中国人，就足以防止共产党或外国人对泰国的渗透。”^[11]上述讲话表明，披汶最初并未将中国共产党政府打上“敌对政府”的烙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披汶政府既未立即承认新中国政府，也未立即表态反对，而是抱着“等等看”的中立态度静观事态的发展。这一点也可以从泰国外交部长的讲话中得到证实。1949年12月1日，时任外交部长朴·沙拉信在议会答复议员皮泰·初迪努奇的质询时说：“政府还在研讨是否承认中国新政府。意识形态或政治目标的不同，并不是我们所考虑的问题，苏联是共产主义国家，但我国仍与其保持友好关系就是一个明证。一个国家以何种形式治国，是他们内部的事情，与我们无关。”他同时指出，泰国政府之所以尚未表态，是因为中国内战尚未完全平静下来，“只要国民党政府仍然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我们就不能随便承认别的政府”^[12]。披汶的左右手、警察总监炮上将也提醒政府，在严密防范共产主义渗透的同时，要避免将共产党中国树为敌人；他认为，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也并不意味着泰国就将变成一个共产主义国家^[13]。显然，社会制度异同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并未成为影响泰国政府决定政治立场的主导因素。

披汶政府后来改变“观望”立场并完全倒向美国，成为美国在东南亚的反共桥头堡，这当中既有美国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因素，也与新中国的侨务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 中国政府为改善双边关系做出积极努力

泰中紧张关系能够在1955—1957年间出现短暂的缓和，除了受国际大气候的影响外，同中国政府做出的种种外交努力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双重国籍问题的解决

华人的身份问题一直是困扰泰中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因素。中国自1909年颁布第一部国籍法以来，历届政府都延续了“以血统确定国籍”的原则，规定只要父母一方为中国籍，不管在中国境内还是境外所生的子女均具有中国国籍。而泰国自1913年第一部《国籍法》以来，就一直坚持“出生地原则”，规定凡在泰国境内出生的人，不论其父母属何国籍，均为泰国公民。这样，很多在泰的华人自然拥有了双重国籍。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初，在泰国的350万华人中，具有双重国籍者约为230万^[14]。受冷战思维的影响，泰国统治集团一直担心在泰华人政治上倾向中国，成为“红色中国”向当地输出革命的海外载体，同时又担心中国政府会以保护华侨权益为借口而干涉本国内政。1955年4月，时任泰国外交部长旺·威泰耶康亲王在万隆会议上发言时就指责中国利用具有双重国籍的华侨在泰国推行颠覆政策。因此，华人双重国籍问题成为中泰关系缓和并走向和解的障碍。

面对“华人效忠谁”的国籍冲突问题，新中国政府采取了务实的态度，积极采取措施消除周边国家的疑虑，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1954年9月23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华人的国籍问题是中国过去的反动政府始终不加以解决的问题，这就使华人处于困难的境地，并且在过去常常引起中国同有关国家之间的不和。为了改善这种情况，我们准备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准备首先同已经建交的东南亚国家解决这个问题。”^[15]1955年12月，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指出：“凡是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问题，我们都要来解决”，“华侨问题也应该适当地解决，免得有些国家说我们要利用华侨捣乱。”^[16]

在东南亚诸国中，印尼率先冲破资本主义阵营的阻挠，于1950年4月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故此，中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印尼来率先解决双重国籍这个棘手问题。1955年4月22日，中国与印尼外长在万隆签署《中国和印尼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同年6月，两国就条约的目的和实施办法达成了谅解，并进行了换文。1960年12月，双方制定并公布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的实施办法》。条约、换文和实施办法详尽地反映了中国政府对待华人双重国籍问题的政策，基本主张

包括：一个华人不应该有双重国籍，要取得所在国国籍，就必须放弃中国国籍；如果愿意保留中国国籍，就不再是所在国公民。中国政府希望华人自愿选择所在国国籍，取得所在国公民资格，完全效忠于所在国；他们同中国的关系，只是亲戚关系。如果他们选择中国国籍，作为华人就应当尊重所在国法律，不参加当地的政治活动。有华人的国家不应歧视华人，华人的正当权益应该受到当地政府的尊重和保护的。

针对泰国政府对华人双重国籍问题的担忧，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向泰国外长提出建议，希望以印尼为模式，根据自由选择国籍的原则解决泰国华人的双重国籍及政治归属问题^[17]。

（二）中国政府积极调整侨务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海外众多华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认同中国，而且在行动上响应中国政府的各种号召，激起了当地政府的恐慌，东南亚各国普遍流行“华人是中国的‘第五纵队’”的谬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间关系的正常化。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领导人旗帜鲜明地确立华侨不介入和参与侨居国政治的原则，尤其是严格区分华侨工作与侨居地革命，即“各国非法活动或是革命，但那是本国自己的事，华侨不应该参加。”^[18]

1954年12月，毛泽东主席会见缅甸总理吴努时说：“在缅甸的华人中也有激烈分子，我们劝他们不要干涉缅甸内政。我们教育他们服从侨居国的法律，不要跟以武装反对缅甸政府的政党取得联系。我们在华人中不组织共产党，已有的支部已经解散。我们在印尼和新加坡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嘱咐缅甸的华人不要参加缅甸国内的政治活动，只可以参加缅甸政府准许的一些活动，如庆祝活动等等，别的就不要参加”；毛泽东同时表示：“我们在泰国有三百万华侨，我们的方针也是一样。”^[19]

1955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接见泰国代表团时，首先批驳了当时正在泰国流传的“中国准备利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作为侵略泰国的基地”的谣言，并主动邀请泰国客人在回国前顺便访问云南，以便亲眼证实，中国是否如传言所说的那样正在做入侵泰国的准备^[20]。他同时明确表示：“我们国外华侨的共产党组织也取消了，以消除华侨所在国政府的怀疑，使大家互相信任”；他又重申：“口说无凭，你们以后还可以看事实。看的时间久了，就看清楚了。”^[21]

毛泽东所说的事实之一就是中共停止在海外华人社会的组织发展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共中央设有以朱德为主任的海外工作委员会。该委员会曾积极领导、推进海外尤其是东南亚一带的侨运工作，发展了不少华党员。1952年1月，由毛泽东签发的《中共中央关于海外侨民工作的指示》在继续强调保护华侨和统一战线的同时，要求“海外侨民一切活动应严格遵守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和我国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中国侨民不应参加以直接推翻当地政府为目的的活动”；强调“侨民中的工作和侨民团体的工作，应当是公开的合法的，不做秘密工作，不组织秘密团体”；申明中共不在海外华侨中建立组织，原有的组织“应经过一定步骤做到最后宣布取消”，同时劝告国内各民主党派“不要建立海外支部”^[22]。

（三）中国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促进泰中关系和解

1953年朝鲜停战后，中国政府开始逐渐放弃东西方两大阵营的“二元”战略思维，提出非意识形态化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中国政府来说，朝鲜战争后的当务之急是国内经济建设，对外关系的首要目标是营造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积蓄力量，最终完成对台湾的统一。基于这种方针，中国一方面继续加强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友好关系，一方面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积极主动地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同时探索着与日本及一些西方国家发展经济文化交往，以促进政治承认。

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中国总理周恩来做了著名的“求同存异”的精辟发言，强调“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原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是可以实现和平共处的。”他同时指出：“根据这五项原则，中国同泰国、菲律宾等邻国的关系没有理由不能获得改善”，再次重申中国希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泰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会议闭幕前，周恩来总理与泰国代表团团长、泰国外交部长旺·威泰耶康亲王进行了会晤，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泰两国政府之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周总理向旺亲王建议可以根据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解决双重国籍问题的原则，解决泰国华人的国籍问题，并邀请旺亲王到中国访问。

1955年底，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泰国秘密使团

时指出,泰国实行君主制并不妨碍中泰之间的友谊,“各国人民都必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体制,我们当然不能仅仅因为国家制度的不同而去批判他们或拒绝与他们交朋友”。周总理还形象地比喻说,“建立友谊像喝茅台酒一样,要慢慢来,酒喝快了容易醉,匆忙建立的友谊也不能持久。”^[23]

1955年12月16-17日,中泰两国政府代表在中国驻缅甸大使馆举行了秘密会谈。中国在送交泰国的会谈备忘录中指出:中国政府愿意同泰国政府建立友好关系,中泰关系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中国绝不会侵略别国,不会以泰国为敌,也希望泰国不要以中国为敌,希望中泰双方和平共处;中国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是按照中国宪法规定而建立的民族区域自治地区,为了使泰方了解真实情况,中国政府欢迎泰国代表团前往西双版纳访问;关于泰国华人的双重国籍问题,如果泰国政府同意,中国政府愿意以解决印度尼西亚人双重国籍问题的方式,解决泰国华人的双重国籍问题;中国政府愿意同泰国政府建交,如果泰国政府认为条件不成熟,中国愿意等待。中国政府声明,如果泰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必须割断和台湾当局的一切官方联系;中国愿意同泰国进行贸易交往,如果目前泰国还不能同中国直接贸易,可以通过香港进行^[24]。

中国政府的上述努力,充分展示了中国睦邻友好的诚意,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泰国当权者的疑虑,对披汶政府下决心迈出泰中关系正常化的第一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三 国内政治、经济压力迫使披汶对华态度转向

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既是基于对国际形势判断的抉择,也是对于国内政治做出的反应,即“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对外延续”。美国学者詹姆斯·罗森诺也曾指出,一个国家的内外政治一般都是互相影响、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因果循环关系。泰国总理披汶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主动调整对华政策,其最根本原因就在于泰国统治阶层内部权力斗争激烈,披汶的领导地位受到警察总监炮和陆军司令沙立将军强有力的挑战。面对政敌威胁,失去军队支持的披汶急需寻找新的政治力量来维护其统治地位,而唯一能与“枪杆子”相抗衡的力量就是民意。为了讨好和拉拢民意,披汶改变了执政思维,

大幅度调整内外政策,以迎合民众的普遍愿望。可以说,缓和与中国关系政策的出台是披汶为了维护个人政治利益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政治策略。这也是外交政策服务于内政的一个具体表现。

(一) 应对内部权力斗争,披汶改变执政思维

从1954年沙立出任陆军司令一职起,泰国统治集团内部就形成了“披汶一炮一沙立”三足鼎立的政治局势,三个权力集团之间在政治经济权力上的斗争日趋尖锐,矛盾日渐公开化。为了巩固权力基础并实现长久统治,披汶一方面想方设法削弱对手的势力,一方面也一改独裁的常态,鼓吹“自由、民主”的高调,软化对华敌视态度,企图以“民主改革”及“追求和平”的新形象争取各界人士的支持,巩固其日渐脆弱的权力基础,并为1957年大选提前拉票。

1. 国内权力斗争激烈,披汶领导权受到挑战

披汶1948年上台时,国内政治环境比1938年更加复杂。首先,社会上存在着多股反政府势力,既有思想左派的“自由泰”组织,又有不喜欢披汶个人的陆海军军官。1948年、1949年和1951年,反政府势力三次发动军事政变,企图推翻披汶政府,最后虽以失败而告终,但始终是困扰披汶执政的一个破坏因素。其次,屏·春哈旺集团在政坛上异军突起,独霸军权,直接威胁披汶政权的稳定。领导1947年11月军事政变的屏·春哈旺中将在政变后亲自出任陆军司令,并将守卫曼谷的陆军第一师交给爱将沙立·塔纳叻指挥,同时把女婿炮·西亚暖扶上警察总监助理的位置,从而牢牢掌握了泰国的军警大权。在政治动荡不安的泰国,谁掌握了军权,谁就拥有了政治主动权。因此,政坛上由此形成了两个权力集团,一个由披汶领导,另一个则以屏·春哈旺为中心。

久经政治磨炼的披汶清楚地认识到,军队是维护政权稳定的支柱力量,军权一日不在手,他的政府就一日没有安宁。根据对形势的判断,披汶在明知自己无法以强硬手段从屏·春哈旺手中夺取军权的情况下,决定采取“利益诱惑”和“权力制衡”双管齐下的策略消除军人集团的威胁。

所谓利益诱惑,就是以提升军衔和职务的方法收买人心,主要对象就是军中少壮派将领沙立,以实现间接控制军队的目的。在披汶有意识的栽培下,沙立的军衔从1948年的上校迅速升到1952年的上将,其职务也由1947年的陆军第一师师长升

至第一军军长、陆军司令助理、陆军副司令，最终于 1954 年出任陆军司令一职^[25]。

所谓的“权力制衡”策略，就是在扶持沙立的同时，披汶又以镇压、防范共产主义威胁为理由，积极壮大炮·西亚暖领导的警察队伍，希望以此制衡沙立，防止军队独自坐大。因此，在沙立官职迅速攀升的同时，炮也像坐火箭似的从警察上校升至警衔上将，最后官拜警察总监。同一时期，美国人也看上了炮，认为他不仅领导能力强于沙立，而且是一位立场坚定的反共产主义斗士，其最大贡献就是推动泰国政府于 1952 年 11 月出台《反共条例》^[26]。因此，美国中央情报局决定重点扶持炮及其领导的警察力量，主要是通过一家名为“东南亚海外供应公司”（Overseas Southeast Asia Supply Company）的美国公司向泰国警察提供大批新式武器装备，同时派遣专家训练泰国警察。美国人的观点与披汶的想法不谋而合，促使炮的实力迅速壮大，警察总局先后增设了警察突击队、边防警察、警用航空队、水警队、骑警队、坦克与装甲警队等多警种队伍，拥有美国提供的飞机、坦克和巡逻艇等武器装备，战斗威慑力丝毫不比陆军逊色。1955 年，炮手下的警员达到了 48 000 名，其中在曼谷就有 10 000 名警察，而且个个装备精良^[27]。炮因此而口出狂言：“太阳底下，泰国警察无所不能！”^[28]

1954 年，沙立如愿以偿地从屏·春哈旺手中接过陆军司令一职；几乎在同一时期，炮也在警察系统飞黄腾达，坐上了警察总监的位置，两人都到达了职业生涯的最高峰。权力膨胀后的沙立和炮谁都不服谁，由此开始了一场明争暗斗的政治角逐。炮的亲信普·布拉纳松浦在回忆录中说：“沙立将军与我家老板的关系本来就有点不顺畅了，而披汶元帅还在两边煽风点火，时间长了，沙立将军就和我家老板反目为仇了。”^[29]沙立和炮都利用宣传机器展开唇枪舌战，由沙立支持的《自由通讯》报与炮操纵的《泰民族》报隔三差五就要向对方发动攻击，互揭老底。《泰民族》报喜欢以妻妾成群、贪污腐败等问题抨击沙立，而《自由通讯》则对炮残酷镇压反对派人士、肆无忌惮贩卖毒品以及伪造货币等种种黑暗面进行曝光。结果，《自由通讯》报的报道更贴近老百姓，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因此在这场口水战中占了上风^[30]。最能证明沙立和炮关系之紧张的材料应该是下面这段记录：1957 年 9 月 16 日，沙立发动军事政变，推翻

披汶政府，炮在政变当天向军方自首时质问沙立：“你想把我怎么样？”沙立回答说：“我没有想过要杀你，只有你一直想要我的命。”随后，沙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政变的目的只有两个，一个是要求披汶内阁总辞职，一个就是要求炮辞去警察总监的职务^[31]。

权力的扩张引发了政治野心的膨胀，沙立和炮都对总理职务虎视眈眈，而披汶也很快就察觉到来自沙立和炮的潜在威胁。1954 年，陆军司令屏·春哈旺表示出退位的意愿，披汶遂要求兼任陆军司令一职，称：“如果把军权交给沙立，我们今后会有麻烦。”^[32]显然，披汶此时已对沙立有所防范，但因军权旁落，披汶也奈何不了沙立。结果披汶的预言不幸成真，1957 年 9 月陆军司令沙立发动政变，推翻了披汶政府。另一方面，警察总监炮也是蠢蠢欲动，对政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1955 年 3 月 18 日，新加坡一报纸公开披露，“再过不久，泰国警察总监炮将接任披汶的总理职务”。该消息被沙立的《自由通讯》转载，引起社会哗然^[33]。同沙立与披汶的关系相比，炮与披汶的关系显得更加密切：他可以不受时间限制随意进出披汶的官邸，而且可以直接进入卧室面谈；当披汶出国访问时，由炮负责每天向披汶通报国内政情^[34]；1955 年《政党法》出台后，披汶成立了“玛兰卡西自由党”，自任该党主席，让炮出任党的秘书长，结果炮在党内的职权甚至超过了披汶^[35]。

2. 对抗政敌，披汶调整内外政策

俗话说“一山难容二虎”，“三虎”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在警察总监炮的政治野心被媒体曝光后，披汶对炮采取了防范措施。他乘炮出国访问之际，一口气剥夺了炮的两项重要职权：一是取消立法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本来是披汶为控制国会议员而设立的机构，负责人就是炮；二是调整内阁，解除了炮兼任的财政部副部长职务。另一方面，披汶还冠冕堂皇地借用政策法规来限制沙立和炮的职权。1954 年 8 月 25 日和 26 日，披汶先后推出了两种部门法规，即内政部的《关于使用、调动和动员警察力量的规定》和国防部的《关于使用、调动和动员军队的规定》^[36]。上述法规分别规定，任何使用、调动、动员警察或军队的行为，都必须事先得到内政部部长或国防部部长的同意。而法规出台之时，内政部与国防部都直接掌握在披汶手上。因此，该措施出台的真实目的是要限制陆军司令沙立和警察

总监炮调动军队与警察的随意性,防范可能发生的武装政变。对于这一点,披汶本人后来也坦言承认^[37]。

根据当时临时宪法的规定,泰国将于1957年举行大选。在泰国政坛上发号施令10多年的披汶对权力着了迷,企图在1957年后继续掌权,但面对沙立和炮一左一右两个政治对手,其连任前景并不光明。在这种背景下,披汶于1955年4月14日至6月22日出访欧美诸国,同军人出身的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进行了长谈。这是披汶时隔30年后首次出国。访问归来,披汶的政治思维发生了变化。1955年7月1日,也就是从欧美考察回来后不到两个星期,披汶主动表示将在适当时候辞去总理的职务,以参加1957年大选^[38]。此后,针对法律规定“元帅”等同于永久性公务员而不得参选的问题,他又公开表示将奏请国王取消他的“元帅”职衔^[39]。同年9月29日,披汶又注册成立了“玛兰卡西自由党”,亲任党主席,正式宣告他将以民主方式参政的决心^[40]。

披汶建设“民主政治”的措施还包括:放宽对报纸的管制,让报纸拥有自由报道权;建立每周一次的新闻发布制度,希望报纸能成为政府与人民间加强了解的桥梁;允许持不同政见者在皇家田广场举行大型集会,自由发表意见或政治主张,并命令各府尹为当地群众的政治集会提供活动场地;撤销了两个负责监管公务员政治动向的特别委员会;推出泰国第一部《政党法》规定“只要获得现有国会议员10人以上支持或得到500名群众的署名支持,就可以注册一个政党”,并允许正式注册的政党开展政治活动,等等^[41]。其实,在这一系列民主举措的背后,隐藏着披汶的一个政治企图:以开放有限度的民主,争取民意的支持,以民主势力抗衡军警集团。显然,这一切都是受到欧美民主政体的启发。

上述“新政”措施虽然没有给泰国带来真正的民主,但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军人集团把持政权以来的政治紧张气氛。这一时期,大小政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截至1957年2月大选前,共有22个政党注册成功。在这些政党中,有6个政党领导人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思想倾向,因此被称为左翼政党,它们包括“经济人党”、“社会民主党”、“海德公园运动党”、“社会主义党”、“自由民主党”和“工人党”,前4个政党还于1956年7月12公

开宣布结成“社会主义联合阵线”^[42]。上述政党虽然在经济发展政策上有不同的看法,但在对外政策上却有着相同的基本点,即主张和平中立,反对泰美结盟,反对东南亚条约组织,要求政府取消《反共条例》,承认新中国政府。

尽管披汶的“玛兰卡西自由党”与上述政党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主张,但为1957年大选着想,披汶不得不对左翼政党的政治要求做出积极的回应,在对华政策上迈出了善意的一步——不仅于1955年底派出秘密使节访华,并与中国政府代表在缅甸会晤,而且打开了紧闭已久的民间交往大门;尽管没有明确宣布废除《反共条例》,但在实际操作上已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二) 迎合民意,披汶对华经济政策转向

披汶政府外交政策倒向美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看上了美国的经济援助。但是,美国所谓的“援助”附带有各种各样的条件,包括:泰国必须扩大军队规模和增加军费;禁止泰国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进行贸易;泰国企业不得与美国企业进行竞争,等等。结果,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政策给泰国经济造成了难以估计的损失。

泰国是农业国家,大米占出口总值的一半以上,是国家重要的财政来源。但是,从1951年起,泰国大米出口逐年下降,一是受禁止同社会主义国家贸易的政策影响,二是美国倾销剩余农产品,夺走了泰国的主要出口市场,致使泰国大米出口锐减。如表1所示,1951年出口156万吨,1954年跌至100万吨左右,而当年可供出口的大米有200多万吨。美国的利己行为导致泰国米业处境艰难,碾米厂大部分陷于半停工状态。另一方面,泰国另一重要出口物资——橡胶遭到美国的垄断性压价,价格偏低,致使泰国的橡胶收入从1951年的9770万美元降至1954年的4390万美元,减少了一半多^[43]。

一方面是出口锐减,另一方面却大量进口备战物资,这导致泰国的贸易状况日渐恶化。从表2可以看出,1947—1949年,即朝鲜战争爆发前,泰国主要商品大米、橡胶、锡的出口不受限制,每年贸易逆差额并不大;1950—1952年,即朝鲜战争期间,大米、橡胶等战略物资大量出口美国,为泰国创造大量外汇收入;但1953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对橡胶、锡等战略物资需求量减少,同时出口市场又受到贸易禁令的限制,导致泰国当年出现贸易逆差7亿多铢,1954年更上升到11亿多铢。这

一时期,泰国国内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大批工商业企业倒闭,成千上万人失业,百姓怨声载道。

表 1 1951—1954年泰国大米出口统计表

年份	大米出口量(吨)
1951	1,569,800
1952	1,419,500
1953	1,353,100
1954	1,022,500

数据来源:泰国国家档案馆外交部文件,第70/49号。

表 2 1951—1954年泰国贸易平衡状况

年份	贸易顺差 (百万铢)	贸易逆差 (百万铢)
1947	-	139.3
1948	-	57.3
1949	-	152.8
1950	695.1	-
1951	759.4	-
1952	136.1	-
1953	-	719.7
1954	-	1,108.4

数据来源:泰国国家档案馆内政部文件,第0201.2.1.26/20号。

泰国各界人士越来越多地认识到继续跟随美国扩军备战只会给泰国带来更多的灾难,纷纷呼吁政府改变“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摆脱美国的束缚,发展与中国等国家的正常贸易关系。议员彭泰·触的努七指出,泰国当局片面追随美国的对外政策已使泰国经济情况陷于困难境地,泰国经济唯一急需做的事情就是扩展对中国的直接贸易;泰国副总理哇拉干·班差也认为,“继续实行禁运政策,在某些方面将使泰国的经济遭到损失”;泰国自由民主党议员阿里·丹的域差军称,同中国直接贸易,其实不该成为问题,如果有问题,那只是由于泰国处在美国的控制之下而已^[44]。

泰国的媒体也纷纷发表社论,主张同中国建立正常关系。《暹罗群众》报评论说,禁运政策只对美国有好处,而东南亚国家却因对中国“禁运”而丧失了良好的出口市场。《经济》半月刊还发表了题为《同中国贸易是泰国的出路》的社论,指出解决泰国经济危机的途径是在互利基础上开展和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的贸易;泰国片面同西方国家

市场挂钩的结果已清楚地表明,泰国商品在市场和价格上一直受到不公平待遇。社论说,泰国人民要求开展对华贸易,政府不应忽视人民的要求。《泰人》报也发表社论指出,禁止同拥有六亿人口的国家进行贸易,其实是一种自我禁锢。更严重的问题是,当泰国不卖商品给中国的时候,别人却在自由自在地同中国进行贸易^[45]。

日益严重的经济问题迫使披汶不得不重新考虑对华政策。1954年3月,披汶指令泰国外交部尽力搜集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贸易协议,以供内阁参考。内阁会议要求外交部起草同社会主义国家开展贸易关系的框架文件,但是遭到外交部的反对,认为此举违反了泰美经济和军事援助协议,调整对华政策一事由此被暂时搁置^[46]。1956年5月,披汶总理再次要求外交部检讨对华贸易禁令,要求提供详细的利益得失报告。结果,外交部这一次推翻了1954年的意见,认为泰美经济和军事援助协议只禁止泰国战略物资,即橡胶和锡的出口,而大米和其他商品不在上述协议的限制范围之内^[47]。时任泰国外交部长那拉底。在5月31日就中泰关系向媒体发表讲话说,由财政部、经济部和外交部联合起草的泰中直接贸易计划书将于近日提交内阁研究,计划书中特别说明泰国商人同中国建立直接贸易关系并不算犯法。此后,泰国对华贸易政策出现松动。6月13日,泰国政府决定允许自由输出大米和木材给所有国家,包括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6月15日,泰国总理披汶说,同共产党国家建立贸易关系已经是整个国际局势的发展趋势,泰国重新调整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是必要的;同一天,泰国财政部长兼代理经济部长帕姆里攀·裕他吉承认,泰国同中国进行直接贸易有助于泰国政府推行压低物价的政策,他鼓励泰国商人大胆同中国进行贸易;6月21日,泰国政府正式发表声明,决定从即日起开始解除关于非战略物资贸易的禁令,泰国可以同世界上任何国家进行自由贸易^[48]。

总而言之,军人出身的总理披汶深知“枪杆子出政权”的道理,而且他本人也曾因握有“枪杆子”而受益匪浅,依靠军警力量的支持而两度上台执政。但是,当沙立和炮两大权力集团分别剥离了披汶领导权赖以生存的两大支柱——军队和警察后,披汶就不得不寻找新的政治力量来为他的长久执政保驾护航。而此时,他唯一能借用的力量就是民意。拉拢民意就要顺应民意,面对民意的诉

求,在国内实行有限度的民主及缓和泰中紧张关系,就成为披汶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遗憾的是,泰中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现的缓和趋势只是昙花一现。1958年,由于泰国

国内政治局势的突变,泰中关系又重新进入了黑暗时期。沙立的军人政变导致了极端亲美的政府的产生,泰国再一次站在了中国的对立面。

【注 释】

- [1] 阿利·披荣著,林明点译《新时期泰中建交之内幕》,香港嘉富林国际有限公司,1999年,第76-77页。
- [2] 张锡镇:《中泰关系四十年》,《东南亚研究》1990年第2期。
- [3] 朱振明、谢远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中泰建交》,《东南亚》1990年第1期。
- [4] 常媛:《龙之珠》,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11页。
- [5] 宋晓东:《50年代后期—70年代初期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与越南抗美救国战争》,郑州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第9页。
- [6] 同[2]。
- [7] 〈泰〉泰国总理府文件,第0201.12/14号。
- [8] 〈泰〉泰国总理府文件,第0201.7.2.1/50号。
- [9] 《泰国外交部长那拉底说 泰政府在改变对承认中国的固有态度》,新华社电讯稿,1956年6月8日。
- [10] 〈泰〉泰国总理府文件,第0201.77/25号。
- [11] Daniel Fineman, *A Special Rel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ilitary Government in Thailand, 1947-1958*,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pp. 89-90.
- [12] 〈泰〉泰国下议院会议记录,1949年12月1日第8次特别会议。
- [13] 〈泰〉首牧·英彩亚卡蒙:《披汶政府对华政策》,泰国朱拉隆功大学硕士论文,1991年,第21页。
- [14] 吴前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睦邻友好关系开辟的前提——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解决》,《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 [15] 《周恩来论华侨的国籍问题》,暨南大学图书馆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网站, http://hqhr.jnu.edu.cn/news/content.asp?news_id=8990, 2008年12月8日。
- [16] 陈文寿:《毛泽东的侨务观:侨务·统战·外交》,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1847>, 2006年11月22日。
- [17] 同[2]。
- [18] 同[16]。
- [19] 同[16]。
- [20] 同[3]。
- [21] 同[16]。
- [22] 同[16]。

- [23] 同[3]。
- [24] 同[3]。
- [25] 〈泰〉泰国内阁:《沙立·塔纳叻元帅文选 1959—1961年》,泰国总理府印刷中心,1964年,第3-4页。
- [26] 〈泰〉《政府公报》,1952年11月13日。
- [27] 〈泰〉詹塔拉·布拉那叻、毕亚纳·本那:《1920—1963泰美关系的政治后果》,泰国朱拉隆功大学研究报告,1978年,第141、144、148页。
- [28] 〈泰〉蓬·普帕:《扭转乾坤的元帅》,泰国湃琳出版社,1995年,第34页。
- [29] 〈泰〉普·布拉纳纳浦:《亚洲铁人的13年》,曼谷巴拉潘山出版社,1983年,第182页。
- [30] 〈泰〉春赛·猜亚瓦:《炮·西亚暖警察上将与政治权力的争夺》,泰国朱拉隆功大学硕士论文,1995年,第153页。
- [31] 同[25],第72-73页。
- [32] 〈泰〉屏·春哈旺:《生平与历史事件》,阿努甘出版社,1973年,第99页。
- [33] 〈泰〉《自由通讯报》,1955年6月10日。
- [34] 〈泰〉泰国国家档案馆:内政部文件,第0201.2.1.56/15号、第0201.2.1./604号。
- [35] 〈泰〉马努·玛卡西拉:《1947—1957披汶巩固政权之策略》,泰国诗那卡琳大学硕士论文,1976年,第68页。
- [36] 〈泰〉泰国国家档案馆:内政部文件,第0201.2.1.23/41号、第0201.2.1.8/76号。
- [37] 〈泰〉泰国国家档案馆:内政部文件,第0201.2.1.56/15号。
- [38] 〈泰〉《屏泰报》,1955年7月3日。
- [39] 〈泰〉《自由通讯报》,1955年7月15日。
- [40] 〈泰〉朝纳瓦·苏拉帕:《泰国政党》,曼谷育南澎社团出版,1973年,第177-178页。
- [41] 同[37]。
- [42] 〈泰〉《沙炎尼功报》,1956年7月13日。
- [43] 《曼谷的新动向》,新华社电讯稿,1956年7月25日。
- [44] 《泰国—此名流主张“建立中泰友好的贸易关系”》,新华社电讯稿,1956年1月10日。
- [45] 《泰国国王强调同中国贸易的重要性 财政部长要泰国商人大胆同中国进行贸易》,新华社电讯稿,1956年6月26日。
- [46] 〈泰〉泰国总理府文件,第0201.45/23号。
- [47] 〈泰〉泰国总理府文件,第0201.45/42号。
- [48] 《泰国宣布解除非战略物资贸易禁令》,新华社电讯稿,1956年6月28日。

【责任编辑:吴宏娟】